

教派与权争：静安寺住持 传继纠纷（1922 – 1923）

丁希宇

1922 年冬，上海诸山会议废黜静安寺六根的住持资格，公举谷云继任新职。围绕住持传继，“十方派”与“剃度派”相颉颃。前者依恃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实际执掌静安寺大权；而后者则运动中国各级行政官厅，坚持“因案撤换”与“传继合法”应当分别办理，会审公廨司法干涉行政。透过静安寺纠纷案，亦可窥视民国时期政教、僧俗之间的博弈互动。

关键词：静安寺 住持 教派 会审公廨 权争

作者：丁希宇，1986 年生，宁波市史志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静安寺是上海市著名古刹之一，相传建自于三国赤乌年间（238 – 251 年），初名沪渎重玄寺。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更名静安寺。宋嘉定九年（1216），寺址由吴淞江畔迁入境内芦浦沸井浜边（今南京西路 1686 号）。清末，寺宇建成现今规模。1945 年，书法家邓散木题额“静安古寺”，沿用迄今。今日静安寺已然成为上海著名旅游景点和佛教参修圣地，香火旺盛。上海市静安区的因该寺得名，显示了该寺在沪地的深远影响。

民国时期围绕住持任选问题，静安寺内部“剃度派”与“十方派”^①纠葛不断。表面看，静安寺纠纷源于教派龃龉，庙产问题实为关键，而隐匿背后的司法与行政权属之争，更显静安寺纠纷的与众不同。本文选取 1922 – 1923 年间静安寺纠纷案为切入点，借以展现当时佛法、教派、世俗间的复杂态势，希图进一步揭示民国时期宗教、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历史图景。

一、公选会议与会审公廨判决

（一）公选会议

1915 年，静安寺住持僧正生圆寂后，由其剃度徒弟六根继任新住持。但六根继任后，因行为不端，被僧常贵控之于公堂，会审公廨责令六根脱离该寺。常贵在沪绅林稚周、姚文栋、姚芝庭等人拥护下，一度主持静安寺。而常贵主持静安寺期间，又被逸善堂代表姚芝庭控诉其与林稚

① “十方选贤”与“剃度传继”是佛教住持传承的两种主要方式。前者原则上要求僧众共食，不分亲疏。住持不能师徒相承，根据选贤任能原则，由当地或上级佛教会主持，经本寺僧众民主协商，推举礼请，并需得到官府批准，类似于世俗社会的民主制；后者寺院内僧侣分房立户，彼此财产独立，寺院住持师徒相承，住持若无直系徒弟，可从师兄弟之弟子中选择，类似于世俗社会的世袭制。

周肆意霸占寺产。至于姚芝庭先拥后反的原因，十方僧众解释为“分赃不均”。^①常贵病故后，上海市佛教公会邀集沪地三十余寺庙寺僧代表，会议复选六根为住持。^②

六根二度继任后，再度引起十方选贤僧众、沪绅姚芝庭、林稚周等各方的抗议并策划选举新住持。上海逸善堂董事姚芝庭率先具稟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嗣后“有愿加入原告者，亦有愿参加被告者”。^③1922年冬，上海县境内的龙华寺、玉佛寺、国恩寺等三十余寺院召开全境诸山会议，公举当地名僧心如（谷云）和尚为新任住持，废除六根的大和尚资格，并推举仰西为总代表，赴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立案。^④会审公廨有意支持十方派，引起剃度派及支持剃度派的各方不满。

上海佛教公会请求上海经董出面干涉，经董陆文麓随即将佛教公会意见转达上海县署。1923年1月，上海市佛教公会及经董等依据《修正管理寺庙条例》相关规定，公议静安寺保护办法，由上海市经董转报上海县公署核准备案，并转咨会审公廨。^⑤

当仰西、谷云等十方派代表大张旗鼓地宣传公选会议并积极插手静安寺寺务时，另一个问题又浮出水面——1922年冬的公选会议到底所议何事？

沪南古云台住持长龄是剃度派的重要代表。长龄投函上海县知事、江苏特派交涉员、江苏省督军省长公署，称“客僧仰西预串姚芝庭赴公廨架讼，冒充丛林推选仰西为僧众总代表，以曾经县长行政处分、受过审判厅刑事判决执行犯僧谷云化名心如，在该会审公廨朦混，夺管静安寺。”在谈井庙开教务会议时，长龄就推举心如为住持、仰西为总代表的公选会议情况咨询列名诸院僧，诸院僧称“实未与闻”。^⑥但长龄的指控与事实不符，姚芝庭并非受客僧运动向公廨控诉六根。姚芝庭也在极力反对谷云接充新住持，第一次堂谕下达后，姚芝庭即委托律师向公廨申辩，“照上海各寺院习惯，住持一席，例系传袭，并无推举之先例”。^⑦

六根之徒志汶也呈文上海县知事，称仰西冒充总代表，请求立案彻查。对此佛教维持会董事程德全立即登报驳斥，“六根暗中怂恿他人捏造事实，向内务部朦混进词”，^⑧希望内务部严肃处理。但不久报纸又登出了《程雪楼之子世模等通告》：“家父年老多病，久不与闻世事。近因病亟……步履维艰，精神日减，力劝静摄，幸蒙俯允，所有各处开会及登报等事，恕不过问。”^⑨也即否定了之前程德全的前述声明，然而第二年报纸却又刊出程德全维护庙产的新闻。^⑩个中因由，颇值玩味。

上海县警察所奉命调查后在复文中提到，参与公举会议的各寺院多数属于客僧下院及大小佛店，所有与静安寺同为剃度派的寺院均未署名。询问公举各寺院僧，“亦只知推举代表系为请求

① 《十方僧众调解静安寺纠纷之文件来稿》，《海潮音》第8卷第6期，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补编》第168卷，北京：中国书店，2008年，第98页。

② 《本境各山公呈》，《徐永柞会计事务所关于被上海社会局聘任静安寺产监督委员》，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92-1-498，第3页。

③ 《争管静安寺庙产案纠纷益甚》，《申报》，1923年2月1日。

④ 《静安寺呈诉节略》，《日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关于控告静安寺僧德悟不法各情案的文件》，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R1-16-181，SC0109。

⑤ 《静安寺之主持问题》，《中华新报》，1923年4月16日。

⑥ 《内务部公文》，《徐永柞会计事务所关于被上海社会局聘任静安寺产监督委员》，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92-1-498，第7页。

⑦ 《静安寺住持争执之未已》，《申报》，1923年3月28日。

⑧ 《内务部公文》，《徐永柞会计事务所关于被上海社会局聘任静安寺产监督委员》，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92-1-498，第8页。

⑨ 《程雪楼之子世模等通告》，《新闻报》，1923年8月10日。

⑩ 《程德全为上邑寺院请命》，《申报》，1924年4月26日。

撤销佛教公会，并不知有公推心如为静安寺住持情事”。“今心如接充该寺住持，与该寺有关各董都未曾闻，但出于僧一方面之请求，且经调查所得，僧众亦未悉内容”。^①警察所建议由县公署出示布告，令所有寺院呈验注册，由县公署委派妥员专司其事。同时责成董保，随时查验。

而力挺谷云的国恩寺住持开生，对于长龄的指控提出异议，认为警察所调查不实，并历陈静安寺真相。最后，江苏省府指令江苏特派交涉员及县公署“因案撤换”与“传继合法”，分别办理。

（二）会审公廨的前两次判决

经过双方数日的辩论，1923年3月20日，会审公廨就静安寺住持传继案作出第一次判决。判决心如为静安寺正住持，六根不得与闻寺务，并要求有关各施主每人提出五千元的捐助凭证。^②3月22日在警员的陪同下，心如至静安寺施行接收。^③消息传开，各方骚动。

六根率先揭露谷云等人接收静安寺时的暴行，“阴历二月初六日（1923年3月22日）下午二时，突有客籍僧俗七八人，闯进寺内，将各僧寮房一一打开乱抄后，即将寺内向住僧徒、雇工人等一并驱逐，不容暂留。卧室厨房均被封锁，衣服被铺亦不容取。”^④逸善堂董事姚芝庭也随即表示反对，姚氏认为按照上海各寺院习惯，住持一席，例系传袭，并无推举先例，而中华佛教公会更无权干涉，要求公堂收回判决。剃度派僧众及上海佛教公会，相继表态支持姚芝庭的控诉。

仰西与心如的代理律师极力抗辩，“仰西之具稟请求系用大丛林公举为代表之资格，并非用中华佛教公会会长之资格。至其昔年之讼事，实未成立。且控之者又曾登报道歉，有报纸呈案为凭。若心如之与人涉讼，亦系为庙产纠葛，该案现尚在省长公署未了。如谓公举住持，并无先例，是又不然。即以常贵而言，彼之得住持静安寺者，亦系由各寺公举，而非师传”。^⑤会审公廨见一时无从判决，遂决定对于姚芝庭的控诉请求，俟再定期辩论后，会商公布。

为使公众了解本案原委，4月3日，仰西、荣照、印怀等三和尚向报馆寄发公函一件，详述静安寺更易住持真相。公函还对寺庙“公产”与“私产”进行界定，对林稚周等冒名董事企图侵占庙产的行为予以抨击。^⑥

4月11日，会审公廨再次开庭审理。由于公选会议推举心如继承静安寺住持、仰西为总代表得到会审公廨核准，六根与逸善堂等出而反对，指摘心如品行不端，要求公廨停止执行谕令。仰西律师辩护心如屡次与人涉讼，实皆为保管寺产而起，与六根屡犯清规被废不同。而六根等反对方面的律师抓住心如在西林庵任住持时遭撤退一事不放，极力攻击。^⑦

在姚文栋诸人眼中，六根则是另一种形象。3月间，上海佛教公会会董姚文栋、议董曹骧、顾藩等呈文内务部、江苏军民两长、上海县知事，声称：静安寺载在大清一统志，为著名千年古刹。其住持六根是前任住持僧正生徒孙，民国四年依照剃度法派习惯继承接管，与《修正管理寺庙条例》并无不合，且该僧继任以来并无不守教规及违背管理义务各种情节。3月20日，会审公廨骤然撤换住持并以非同派之心如承继，系属违反习惯，与例不符。并恳请县知事迅速函知会

① 《照录上海县警察所主任熊呈复县知事文》，《徐永祚会计事务所关于被上海社会局聘任静安寺产监督委员》，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92-1-498，第6-7页。

② 《静安寺案之判词》，《中华新报》，1923年4月24日。

③ 《静安寺住持已定》，《申报》，1923年3月24日。

④ 《本山报告》，《徐永祚会计事务所关于被上海社会局聘任静安寺产监督委员》，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92-1-498，第1页。

⑤ 《静安寺住持争执未已》，《申报》，1923年3月28日。

⑥ 《静安寺更易住持之真相》，《申报》，1923年4月4日。

⑦ 《争夺静安寺住持之辩论》，《申报》，1923年4月12日。

审公廨撤销原判,即便六根失去住持资格,尚有同派志汶、志法可以继任。^①

静安寺住持一职,自经会审公廨判归心如继承后,“争夺者仍未肯罢手”。上海佛教公会会董姚文栋等、青龙庵住持惠基等,先后具呈江苏督军、省长公署表示强烈反对,并希望公署照会公廨更正堂谕。两长批复“候训令上海县知事确切查复,以凭核办”。^②然而,正处省公署训令县知事查复之际,4月24日,会审公廨第二次堂谕再度判下:

查本案三月二十日之堂谕,系因静安寺住持问题予以核准为司法行政手续,非诉讼事件,原无辩论之必要,仰西和尚被诉之案,当经注销,于资格上不生问题。心如和尚历充杭州广化、苏州虎阜等寺住持,为各寺众所公选,非佛教公会所推举。虽因庙产攻讦林稚周成立侮辱行为,乃系因公获谴,与六根和尚品行不端被诉自愿退让住持者截然不同,其大和尚资格不能以此有所动摇。管理寺庙财产不容丝毫侵占,有义务而无权利。本公堂为寺庙择人,但求能显公益,尤无沙门禅门之可分。该原告姚芝庭诉追寺产,原为保全公益,对于此次堂谕自不应发生异议。而本公堂令各施主提出五千元之捐助证据实为慎重起见,各施主之捐助目的,既无变更,对于选充住持亦无争持之理由。故三月二十日之堂谕未便收回,惟副住持为管理寺庙条例所无,应免选举,准以心如和尚为该寺住持,选举笔录存卷。所有该寺不动产之单契,应暂由本廨检查员保管,出予收据一纸,交该住持心如和尚收执,并由本公堂分函上海县公署、会丈局及该寺挂号之西人查照注册。该寺产永远不得抵押变卖过户,其经租事宜仍由该寺住持延请律师办理,收得租金按月交与该住持入账,并着该住持将该寺每年用度制成预算表程候核夺,于每年年终,再将收支账目报告。如有特别开支,必须本廨核准,不得专擅,所有收得租金,均须存放殷实银行生息,核实开支,该寺一切事实,责成该住持积极整顿。至逸善堂董事,法律上本无地位,既习惯相沿,应仍其旧,惟只准姚芝庭一人,并不得干涉住持权限,仅于公益事项,备住持之咨询。此次诉林稚周案,仍予进行。如追得款项,除律师费外,交付该寺住持收管,以后关于该寺为主体之诉讼,应由住持办理,该董事不得越俎代谋。此判。^③

会审公廨的二度判决似乎有意平衡双方的意见。判决心如为新任住持符合十方丛林的要求,允许姚芝庭为寺院董事以减轻士绅反对派的压力,又规定该董事“不得干涉住持权限,仅于公益事项,备住持之咨询”。而对于林稚周案的另案办理,则在于彰显保护庙产的用意。但从判决效果来看,问题并未根本解决。按此判决,会审公廨对于静安寺有很大的处置权,从而引发了司法权与行政权之争。

二、子孙庙与十方派的明争暗斗

(一) 佛教公会的抗争

上海佛教公会成立于前清。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静安寺、龙华寺、海潮寺等寺住持发起召开佛教公会。议决由静安寺僧正生任会长,姚文栋等人为会董,此后姚文栋得以会董身份参与静安寺寺务管理。常贵病故后,静安寺护法要求佛教公会会董另组监护会,推选僧功缘为正会长,姚文栋、蔡尔康等以议董身份监理寺务。但1922年冬公选会议,仰西等人的议案之一却是撤销上海佛教公会。仰西等人公然提倡撤销佛教公会,引起佛教公会的的天与抗争。

佛教公会首先向公众澄清自身地位合法。姚文栋等人以佛教公会的名义呈文“京、省各大

① 《静安寺住持之再争》,《申报》,1923年4月16日。

② 《静安寺住持问题之两会长批》,《申报》,1923年4月20日。

③ 《静安寺案之判词》,《中华新报》,1923年4月24日。

宪”，声明“上海佛教公会成立于前清光绪三十二年，历受地方官委托，系在地方官范围之内，与部令撤销之中华佛教会^①全不相涉”。^②如此声明，一则是撇清自身与法令废除的中华佛教会之间的干系，以正视听；另则是强调自身在沪地佛教界的地位不可动摇。由此可以判断，姚文栋之所以支持六根而反对谷云接任新住持，也是基于自身权益的考量。

佛教公会通过多种途径反对谷云继任。3月31日，佛教公会呈函上海经董，指责会审公廨判决谷云出任静安寺住持有三不妥：客籍干涉本籍、传法干涉剃度、司法干涉行政。^③在致上海县知事公函中，佛教公会提到“拟邀地方款产处及市经董办事处会同处理”。^④4月9日，上海县地方款产经理处总董秦锡田、上海佛教公会会董姚文栋、上海市经董陆文麓以各自所属团体名义，发布上海本境三团体公呈，表示“随时稟请地方官核示，厚联官绅之力，以坚庙产之保障。”^⑤

在发表三团体呈文的同日，佛教公会又致函高易律师公馆，声明静安寺文契寄存该馆，实防外界侵夺，并警告“毋得擅自断送，如使行强夺，本系法外行动，全邑人士虽不能与抗，亦永久不承认”。^⑥在致内务部呈文中，佛教公会称会审公廨因案撤换住持，以非法派客僧心如继承，“违反习惯，与例不符”，^⑦请求内务部转咨会审公廨改正堂谕。

上海县地方款产处插手静安寺务，遭到十方派的一致反对。当地方款产处经理向上海县临时会议递交《请订本邑保护寺庙财产规程》一案时，静安寺、龙华寺、国恩寺等25寺院立刻联名反对。并召开紧急教务会议，拟定对付办法三项：（一）公函县会议收回成议；（二）请各报馆主持公道，并登载会议各项内容请各界公论；（三）要求佛教维持会出面援助。誓言“此事如不和平解决，当再会议抵制办法。宁僧界全体牺牲一切，非达到取消此案目的不止。”^⑧佛教维持会也积极回应，“保护寺院财产，已概括于民国十年大总统教令公布之《管理寺庙条例》以内，自无地方另立保护之规程”。^⑨

在佛教公会多方运筹反对谷云接任之时，支持谷云的势力除声明接任系公举性制外，又致力于废除上海佛教公会。

国恩寺住持开生在维护静安寺十方派性质方面表现得较为积极。国恩寺是公举心如继承住持的寺院之一，开生多次在公开场面支持谷云反对六根。当姚文栋及青龙庵住持惠基等为反对谷云继任问题奔波之际，开生则呈请督军、省长，请求废除佛教公会。^⑩针对剃度派提出的“冒充总代表，请提案澈究”请求，开生则“声明调查朦蔽，历陈静安寺真相”。^⑪县知事回复，接奉省长指令后再行定夺。在此之前，开生已致函江苏省长公署，请求依法解除非法佛教公会，退还各

① 中华佛教总会成立于1912年4月，为全国性的佛教组织，会址设在静安寺。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下令取消中华佛教总会。其后，章嘉呼图克图、青海等上书政府，改中华佛教总会为“中华佛教会”，各地设立分会，以期团结全国僧尼，继续保护寺产。1918年，北京政府又命令取消中华佛教会。至此，佛教界即处于无组织状态。

② 《本邑绅士公呈》，《徐永柞会计事务所关于被上海社会局聘任静安寺产监督委员》，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92-1-498，第5页。

③ 《上海佛教公会致上海市经董公函》，同上，第5页。

④ 《上海佛教公会致上海县知事公函》，同上，第5页。

⑤ 《上海县本境三团体公呈》，同上，第5页。

⑥ 《上海佛教公会致高易律师公馆丁榕律师函稿》，同上，第5页。

⑦ 《内务部公文》，同上，第7页。

⑧ 《僧界反对保护寺产案》，《民国日报》，1924年1月27日。

⑨ 《程德全为上邑寺院请命》，《申报》，1924年4月26日。

⑩ 《静安寺住持问题之两会长批》，《申报》，1923年4月20日。

⑪ 《请撤静安寺心如住持之县批》，《申报》，1923年7月19日。

寺院产业,并希望在佛教公会正式废除之前,所有被侵占的寺产由仰西暂为保管。省长公署对于取消佛教公会的请求给予肯定答复,至于由仰西暂为保管寺产之事,未予批准。^①佛教公会的合法性成为问题,姚文栋等人将以何种身份参与静安寺寺务,将是他们面临的新难题。

(二) 名誉毁谤案始末

针对仰西等人于1923年4月3日寄发报馆的《静安寺更易住持之真相》,4月16日,剃度派在《新闻报》广告栏刊登署名僧金生“真正真相”的告白,^②抨击仰西、心如等僧人暴行。一场绵延半年之久的和尚名誉案由此展开。

报纸刊登毁谤僧仰西、心如的告白后,二僧即认定金生即志汶,随即延聘律师将金生等数人一并告上法庭,要求恢复名誉,公廨要求被告交保待讯。5月10日,被告金生的代理律师称“此系答复原告之广告,被告今日到案,无交保之必要”。^③但会审公廨依旧判决被告限2日内交铺保三百元,并传新闻报广告部主任及六根到堂,展期7日再讯。5月17日,复讯之期届满,由于被告代表律师尚未返沪,公廨决定改期再讯。^④

6月30日再度开庭审理。参与者除了争讼双方外,当地绅董亦延聘律师到堂旁听。先由原告代表律师将金生所登广告词及所印发之传单当庭诵读。随即由原告仰西上堂指证被告金生即系志汶,从前在静安寺为僧,现已迁出该寺。志汶之律师否认志汶登载此项广告,金生也并非其名。“次根究广告来历,转辗询问。”^⑤新闻报告白部工作人员朱方良上堂供称,“此项告白系由掮客石锦文送来”。质问石锦文稿件来源,石称“由郎静山托为送登”。最后又传讯郎静山出庭,交代告白底稿系由曹耘圃送达,并且曹耘圃出有保单为凭。至此,关于稿件来源初有眉目。心如等人之所以咬定金生即志汶,乃因1922年7月4日,六根呈上海县知事署文内有“金生”字样,并请求公廨调查。“中西官磋商之下,谕改期移传曹耘圃并传僧人慧德,一面函请上海县知事,将民国十一年七月四日静安寺住持僧六根呈文抄送过廨,复讯核判。”^⑥

8月30日三度开庭,此次又增加了曹耘圃、公廨当差王阿桂、永仁和烧纸店主顾志铭等证人到堂。由于当事人慧德因病未能到庭,原告律师首先讯问曹耘圃。被告律师称慧德即金生。原告律师认为,对于金生问题,“须问公堂交保职员姑可明白,遂命交保问当差王阿桂”。王阿桂出庭供称,“公堂判决被告交三百元铺保后,有永仁和烧纸店主顾志铭来保,我询其保何人,答称保僧人金生。”曹耘圃上庭称,本年三月有僧人慧德手持登报稿件前来,托为登报。但所登内容系毁谤他人名誉,关系非小。在曹犹豫之际,僧慧德又取出申报一纸,并告知此消息系侵占静安寺住持客僧所登,此次委托登报稿件系答复该僧此消息。于是曹耘圃盖章担保送达新闻报馆登出。原告律师又质问曹耘圃,既然本案被告(志汶)不承认自己是金生,你又何必出庭为其交保?答曰“是日公堂检察处送来传单,我未在寺内,迨我归来,其余僧人持传单向我说,新衙门传你去,我不知何事,后遂携带传单到案。”^⑦由于当事人僧慧德因病未能出庭,因此判改期一月,俟慧德病愈到案再讯。

10月12日,开庭再审。僧慧德承认,“我在静安寺为和尚时系名金生,嗣由师父派往法租界某寺当家,改名慧德。四月十六日新闻报内之告白系我所登。”在解释为何登报告白时,慧德道出原委,“因原告朦禀公堂给谕受理静安寺财产后,将该寺原有大小和尚七八名逐出。伊等以

① 《请飭佛教会还寺产产之省令》,《申报》,1923年5月3日。

② 《静安寺前任住持嫡传徒孙僧金生等合十泣告》,《新闻报》,1923年4月16日。

③ 《静安寺住持又缠讼》,《民国日报》,1923年5月11日。

④ 《静安寺住持缠讼案展期》,《民国日报》,1923年5月18日。

⑤ 《静安寺住持控案复讯》,《民国日报》,1923年7月1日。

⑥ 《静安寺控案昨日又讯一堂》,《申报》,1923年7月1日。

⑦ 《僧人毁谤名誉案昨讯》,《中华新报》,1923年8月31日。

我系该寺嫡派徒孙，故来哭诉，是以登报表白，使人咸悉其情。”^① 慧德坦言自己并非觊觎寺产，但原告并不认同慧德的解释，代表律师向公廨陈述慧德系冒名顶替，之所以承认自己是法租界某寺院当家，是“欲利用住址在法租界，公堂不能管辖，冀将本案推翻。”^② 庭上双方律师数度攻伐，互不相让。会审公廨判官认为曹、慧等人此种行为确属违法，将慧德和曹耘圃判入被告地位，并各交一百元铺保或洋保，候下礼拜四宣布堂谕。

10月18日为开庭公布堂谕之期，但“慧德、曹耘圃不到，各罚洋五十元，其余各罚洋五十元，不到保洋充公，金生着具结斥释”。^③ 至此，这场和尚名誉毁谤案以谷云和心如的胜诉告终。

10月19日《申报》所刊《和尚被控登报侮辱案之昨讯》开篇即“僧人仰西、心如，在公共公廨刑事科状诉慧德与金生（即志汶）”，文末又以“判金生（即志汶）具结开释”^④ 结束，其他报纸也有类似报道。从毁谤的内容上来看，与六根、志汶等在癸亥二月（1923年3月间）所具《本山报告》中所控内容如出一辙。由此可以基本断定，慧德在案件过程中系冒名顶替金生，而真正署名金生的当是志汶。这也从侧面解释了为何在堂谕公布日期，被告慧德未能到庭。当此争夺静安寺住持不可开交之际，剃度派出而毁谤十方派，其目的不言而喻。住持争夺，明争暗斗此起彼伏。

三、管辖权之争

行政官厅自始至终都在参与静安寺纠纷案的处理，会审公廨的两次判谕下达后，引发各方抗议。行政官厅的介入而引发的权势之争，由内政涉及外交、司法牵连行政，使得静安寺纠纷案变得异常复杂。

剃度派运动行政官厅介入以对抗十方派与会审公廨。青龙庵住持惠基、佛教公会姚文栋先后呈文内务部、江苏军民两长、江苏特派交涉公署声明：六根传继系依照沙门习惯，与《修正管理寺庙条例》吻合，而会审公廨以非法派心如继承住持，违反习惯，恳请地方官转行上海县知事咨照公廨更正。

内务部的意见奠定了省厅以及县知事处理此案的基调。由于惠基和姚文栋二人来呈虽同为一事，但“声叙原由详略互异”，内务部考量情形后，认为“传继合法与因案撤换实难并为一谈，应予分别办理”。^⑤ 围绕“因案撤换”与“传继合法”，中方各级行政机构与会审公廨之间就权属问题展开角逐。

江苏省各级行政官厅遵照内务部指示积极处理静安寺纠纷。江苏省军、民二长在接内务部咨文后，随即训令上海县知事遵照部咨，查明具复。

上海县知事态度有个转变过程。起初上海县知事认为静安寺隶属于公共租界管辖范围，讼案既经公廨判定，县署未便更正。^⑥ 后来在内务部及江苏督军省长要求“因案撤换”与“传继合法”应当分别办理的指示下，上海县知事的态度趋于强硬。在转咨会审公廨时上海县知事称：“静安寺系在本城西隅兼隶公共租界，按照民国十年五月教令公布《修正管理寺庙条例》第三条

① 《静安寺讼案候下堂谕》，《民国日报》，1923年10月13日。

② 《和尚被控登报毁谤案之续审》，《申报》，1923年10月13日。

③ 《和尚毁谤名誉案判决》，《民国日报》，1923年10月19日。

④ 《和尚被控等报侮辱案之昨讯》，《申报》，1923年10月19日。

⑤ 《内务部公文》，《徐永祚会计事务所关于被上海社会局聘任静安寺产监督委员》，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92-1-498，第7页。

⑥ 《静安寺涉讼案之县批》，《民国日报》，1923年4月14日。

规定,当在上海地方长官特别保护之列。”^① 县知事的意旨说明,静安寺纠纷乃县知事职权所及,会审公廨无权管辖。

县知事接奉省长抄件后,于4月26日,旨令上海县警察所前往调查。警察所的调查,在“因案撤换”方面并无疑义,承认六根因不能保管寺产屡被控诉,确已失去住持资格;但在“传继合法”方面却认为不合程序,“心如继承该寺住持,非惟违反剃度派习惯,抑亦不能强附于选贤、传贤、传法三者之列”,^② 建议将现行所有寺庙财产注册,账目公开。县知事就此呈复省军民二长,候示办理。

针对会审公廨无视佛教公会及剃度派的意见,判决心如继承住持。7月19日,六根投函县公署。与之前具文不同的是,这次六根直接以“收回主权”^③ 的名义呈请县知事,意在给地方官厅施加压力。县知事批示此事须呈请省长核示。省长公署就管辖权限问题,特咨文内务部。内务部再次批复,“传继合法”与“因案撤换”应分别办理。

江苏督军省长谨遵内务部指示,复函上海县知事,六根虽失住持资格,但继承问题应按照习惯,从嫡系僧徒中另立住持。此案属行政处分,“传继合法”与“因案撤换”,不能混为一谈。^④ 在随后的训令中,省长公署多次强调“就选举住持而言,自应根据寺庙之派别为断,当然属于行政处分。果其住持确有其他情弊必涉司法范围,另为一问题”,并训令江苏交涉员许沅照会会审公廨。8月16日,许沅知照会审公廨,关于静安寺住持传继问题,奉令归入行政处分,要求会审公廨更正判决。^⑤

虽然中方官厅三令五申坚持静安寺管辖权归属行政范围,但会审公廨却片面据引《修正管理寺庙条例》,企图牢握静安寺管理权。对于中国行政官厅的训令和照会,会审公廨敷衍塞责,并于9月19日做出第三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依旧确定静安寺为十方丛林,由谷云担任住持。^⑥

会审公廨三审判决,满足了心如、仰西等十方派的愿望,但失望的除了剃度派还有中方各级行政官厅。判决虽下,执行不易。1924年,心如拟配合工部局修筑马路,要求姚芝庭到堂将二十七保八图鱼鳞图册借阅,姚则称病不到。心如律师又要求公廨传令二十七保八图地保顾廷芳到庭,^⑦ 而顾廷芳则在县知事的支持下,拒绝在鱼鳞图册上盖戳,谷云律师认为这是该士绅“不满意公堂派心如为住持之人,故遇事干预”。^⑧ 公廨将顾廷芳关押,嗣盖戳后开释。上海县知事为此致函公堂,请求保释,但公廨坚持地保不盖戳即不开释。^⑨ 剃度派还在以各种方式进行着抵抗,北伐前后志汶以捐资助军名义,企图重夺寺权,双方矛盾再度激化。

① 《照录上海县知事公署咨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原文》,《徐永柞会计事务所关于被上海社会局聘任静安寺产监督委员》,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Q92-1-498,第4页。

② 《照录上海县警察所熊主任呈复县知事文》,同上,第6页。

③ 《静安寺住持问题之县批》,《民国日报》,1923年7月20日。

④ 《江苏督军省长公署指令》,《徐永柞会计事务所关于被上海社会局聘任静安寺产监督委员》,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Q92-1-498,第9页。

⑤ 《江苏交涉员公署训令》,同上,第14页。

⑥ 《早堂会讯》,同上,第11页。

⑦ 《寺僧请查契据之集讯》,《申报》,1924年1月13日。

⑧ 《工部局购地筑路之所闻》,《申报》,1924年2月8日。

⑨ 《地保拒绝盖戳被押案之昨讯》,《申报》,1924年2月22日。

四、结 语

教派龃龉揭开纠纷序幕，而权势轳轳则将矛盾推向深入。如果说，剃度派以及支持剃度派的士绅要求的“收回主权”是“别有用心”，那么行政官厅主张的“因案撤换”与“传继合法”分别办理则是法权范围内的正义主张。会审公廨的三审判决无视中国当局的处理意见，则映衬了中国主权丧失所带来的隐痛。

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是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个法律怪胎。1868年签订的《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规定“凡遇案件牵涉洋人必应到案者，必须领事官会同委员审问，或派洋官会审；若案情只系中国人，并无洋人在内，即听中国委员自行讯断，各国领事官，毋庸干预。”^①章程其他诸条内容旨在说明，在上海的外国人享有治外法权，在租界发生的涉及中国人和无治外法权的外国人的刑事、民事案件将由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审理，公廨处于中国政府管辖之下。但当案件涉及外国人时，外国陪审团将与中国审判官同时听讼审理。惩罚罪犯及执行民事决定由中国当局处理。

辛亥革命期间，负责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的中国官员逃逸无踪，公廨处于瘫痪状态。上海的外国领事团和工部局乘机以维持法律和秩序的名义接管了会审公廨。工部局权力急剧膨胀，会审公廨变成工部局的司法肩膀，完全独立于中国政府和中国司法体制。由此造成了本案中，会审公廨无视中国行政官厅的合理要求，司法干涉行政。这已不仅仅是静安寺纠纷问题，更是一个时代的遗留问题。

静安寺纠纷案中，政教、僧俗之间的博弈互动至为明显。斗争大致可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剃度派寺僧、佛教公会、逸善堂在与仰西、谷云为首的十方派的争论中，历陈六根继任系根据宗教习惯，经由各寺院代表公推，并呈报上海县知事备案，并无不当行为。经调查，六根行为不端属实后，代表们则又转向认为即便六根失去住持资格，新任住持应当依宗教习惯，从剃度派僧徒中选择。会审公廨二度判决，均以谷云继承，双方的争辩进入第二阶段。第二阶段中，剃度派代表向中国行政当局，指责会审公廨干预静安寺寺务，是司法干涉行政。行政当局多次援引《修正管理寺庙条例》，证明选举住持属于行政处分，会审公廨无权干涉。对于中国行政当局的多次照会与咨文，会审公廨未予具复。会审公廨的三次判决，主旨一脉相承，既是对剃度派的不承认，也是对中国行政当局的不尊重。难怪时人发出“试问所司何法？既不尊重国家公布之条例，又不尊重大部之解释，并不尊重本省长官之训令。而在沪西之刑事犯之一游僧独尊重之，曰大和尚资格不能有所动摇，岂非司法界之大笑话”^②这样的讽刺。

上海静安寺地处华洋共管地带，租借地的政治生态使静安寺纠纷愈加扑朔迷离。方外与世俗，外交与内政，司法与行政捭阖其间。拓宽研究视野，从不同层面解读民国时期的政教关系，对于增进民国时期国家、宗教与社会之间复杂关系的理解或将大有裨益。

（责任编辑：黄夏年）

①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269页。

② 《附录：会审公廨执法原案》，《徐永祚会计事务所关于被上海社会局聘任静安寺产监督委员》，档案号：Q92-1-498，第10页。